

党史专题研究集

何盛明 著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资助课题

中共党史出版社

目 录

文化工作研究

南方局在领导文化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 / 3

异军突起的“左联”东京分盟 / 9

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抗战文化运动 / 15

香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独特贡献 / 28

人物研究

周恩来对四人帮“打倒一切”的抵制和斗争 / 35

周恩来交友之道的人格魅力——记周恩来与郭沫若深厚的革命情谊 / 42

吴玉章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功绩 / 51

邓小平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 61

刑庭激辩震山城——共产党人张秀熟的革命传奇 / 68

攀西宝地创业维艰的开拓者杨超 / 76

少年中国学会及无政府主义研究

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几点剖析 / 87

无政府主义在四川的流传 / 96

成都《半月》报及半月社 / 105

党史专题研究集

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证 / 113

四川党史研究

解放前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概况 / 129

大革命失败至 1935 年中共四川省委和地方党组织被破坏情况 / 15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武装斗争述评 / 161

中共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 183

几点考证和探索意见 / 196

其他相关专题研究

浅谈“四渡赤水” /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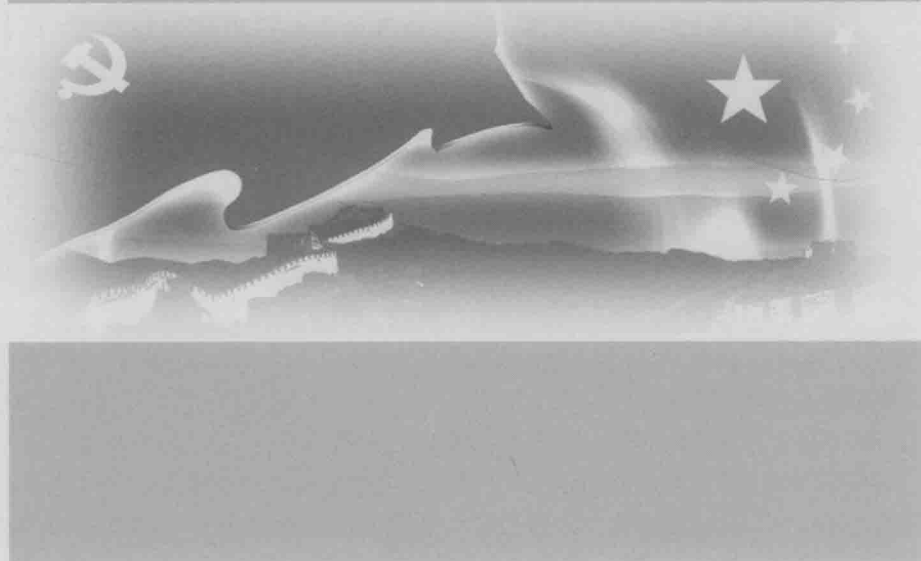
关于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 / 212

党史大事记是历史编著不是资料汇集 / 218

党史编辑纵横谈 / 223

后 记 / 231

文化工作研究



南方局在领导文化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文化宣传工作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后为文化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始终把文化工作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一、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坚持抗战文化的正确方向，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南方局成立后，面临着异常尖锐复杂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竭力推行反共政策，加紧投降分裂活动，在文化方面大肆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采取特务手段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文化团体，迫害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此，南方局以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作为宣传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向全国、全世界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并在形势变化的重要时刻，及时发表言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向群众指明方向。如针对“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倾向，《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不断制造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事件。1939年7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和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1941年皖南事变发



生后，为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事件的真相，刊登了周恩来亲笔题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名扬千古的题词题诗，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向全国人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新四军的血腥罪行。同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新华日报》及时发表社论、专论，指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相互支持的关系和必胜的前途。同时又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反对依赖外援坐等胜利的思想。还报道解放区军民生活、斗争和生产建设，以及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英勇战绩，报道国际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支持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报道国统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的具体形象，是中共联系国统区广大群众的桥梁，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在大后方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起到了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在南方局的指引下，始终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动员民众增强斗志，坚持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人民民主运动中，进步文化界联合中间力量，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等，作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不少著名文化工作者奋战在民主运动前列，有的竟为民主运动而献身。文化运动紧密配合抗日民主运动，取得显著成效，自身也得到不断发展。

二、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遵照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认真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加强国民党主流派、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地方实力派等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同时，周恩来亲自组织抗日文化队伍，推动文化界的广泛联合，把文化界一切愿意抗战的爱国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前后，戏剧界、音乐界、木刻界、漫画界以及自然科学界，都先后建立了抗日团体。这些抗日团体都是在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为神圣使命，结成了坚强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尤其重要的是南方局充分利用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合法地位，把大批文化界的骨干力量组织进去，成为团结文化界一致抗日，推动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战斗堡垒。南方局还推动自然科学界、历史学界和

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共同为抗战呐喊和献力，使抗日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皖南事变后，为确保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1941年5月，南方局及时将聚居在重庆、桂林的文化精英，如茅盾、章泯、宋之的、欧阳山、叶以群、高士其、贺绿汀以及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100多人，有计划地撤退或转移到香港、南洋、延安及内地各县安全地方。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香港文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与东江游击队从日寇铁蹄下，抢救出文化界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300多人，保存了我国文化界精英。^①

为了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进攻，南方局又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合国统区斗争形式的政策，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群众化、合法化”，要求所有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尽可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利用合法身份广交朋友。周恩来要求党内同志学习夏衍在广西桂林、香港等地工作时广交朋友的经验。党内许多同志遵照周恩来指示，在文化界广交朋友，取得很好的效果。关心和爱护文化界的朋友，以诚相待，使广大文化界人士感到党的温暖和鼓励，增加了他们对党的向心力。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迫害文化界人士时，他们精神上受到压迫，生活上处于难以为继的绝境时，《新华日报》以《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为题发表社论，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文艺工作者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以实际帮助和爱护。南方局还通过全国抗敌文协发起援助贫困作家的募捐活动。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被国民党囚禁数年释放后，仍软禁在重庆家中，不准讲演和发表文章，不准教书，处于“救国无门，投稿无路”的绝境中，周恩来派人登门拜访，拿回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马寅初非常感动和感激。在获得自由后，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蒋斗争。

三、批判封建法西斯反动理论，针锋相对地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维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群众》周刊是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理论性刊物，是政治理论战线的前沿阵地。它除了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宣传解放区军民的英勇奋战和建设成就，宣传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外，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

^① 《我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出发,对汪精卫之流的汉奸理论,对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反动理论,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汪精卫在河内发表卖国投日的“艳电”后,《群众》立即在2卷13期上发表社论《民族败类汪精卫》,揭露汪投敌叛国的罪恶行径。接着发表了《汪逆投降卖国的资本》、《主和者就是卖国贼》等多篇社论、时评,深刻批判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和一切有害于抗战的理论,借此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他们竟然从理论上鼓吹封建法西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南方局组织力量,首先对“战国”派进行反击,许多进步文化人士纷纷撰文批驳,《群众》在第七卷上陆续发表了章汉夫的《“战国”派的法西斯实质》、欧阳凡海的《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等文章,对其反动的历史循环论及其所持的对内对外的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接着又对陶百川攻击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从理论上予以批判。1943年《群众》还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反动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南方局根据当时国家民族的主要矛盾,针对国统区文化界的特点,对于人民内部所涉及的文艺和学术理论方面的是非问题,按照具体情况具体研究,采取区别对待,正确引导的方针。抗战中期,文艺界在文艺思想理论上有过几次争论,矛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归纳为三个问题,即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南方局在思想领域中的斗争,很注意策略,对“战国”派的“民族文学运动”,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等的反动文艺理论,虽给予严肃批判,仍旨在促其醒悟。对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问题及“主观”意志的倾向等不同意见,周恩来明确表示,学术上的问题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尽量说理来解决,决不能强加于人。^①文艺界对一些有争议的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305页。

问题，通过内部讨论，开展了争论和批评，既分清了是非，又做好了团结工作。对学术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也是如此，如《群众》周刊曾发表沈友容的《评钱穆的〈文化与教育〉》，对钱穆提出的“中国式的民主”、“孝”与“中庸”等问题，进行了商榷与批评。并特地说明，我们看重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劳力以及他们在一二十年来坚持清寒的教育生活的精神。再如在学术界的读书会上，常对主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当作对立面加以议论，研究他们的言论，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一次周恩来在读书会上，听了他们这些议论，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的斗争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①一席话指明斗争方向，说得大家心悦诚服。

四、以戏剧为突破口，冲击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以丰硕的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成果占领文化阵地，造就了一代文化新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抗战初期各地掀起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进行压制，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迫害。南方局根据形势变化，改变工作方式，号召和安排文化人到农村和到敌人后方去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后，随着政治形势的逆转，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压制和打击愈演愈烈。进步文化界人士采用新的方式开展活动，借用庆祝寿诞、开纪念会、座谈会等进行斗争。如为郭沫若 50 寿辰和创作 25 周年的庆祝会，就是一次很有影响的政治斗争。周恩来说：为郭沫若祝寿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为郭沫若创作 25 周年纪念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为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的围剿和对文化的专制统治，1942 年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下，文艺界组织了阵营强大的演出班子，在重庆上演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轰动了山城，震撼了整个国统区。接着一批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应运而生，如郭沫若的《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李秀成之死》，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等，相继搬上舞台。在重庆三个雾季的大规模戏剧演出中，上演进步剧目达 200 多个，大多是紧密结合现实斗争，或讴歌抗日英雄，或赞美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或抨击时弊，揭露反动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罪恶阴谋，除老一代文艺工作者积极从事戏剧创作外，在抗战中成长的新一代剧作家，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文学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版，第 305 页。

青年，都纷纷参加了这次突击战，写出许多优秀剧作，如陈白尘的《岁寒图》、《结婚进行曲》，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蜕变》等，还有各抗敌演出队在边演出边创作中，也涌现了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同时，以郭沫若为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进步文化界，用丰硕的研究成果占领文化市场。蒋介石原是要用文工会束缚进步文化人士的手脚。周恩来指出：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①鼓励大家用研究成果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占领阵地，与封建法西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周恩来的鼓励下，这段时间学术界硕果累累，如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甲申三百年祭》、《屈原研究》等。毛泽东在延安对《甲申三百年祭》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并指定为整风必读文件。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和纪玄冰合写的《中国思想通史》，翦伯赞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蔡仪的《新美学》等等。文艺作品方面，除大量的剧本外，还有不少中、长篇小说问世，如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茅盾的《腐蚀》，沈从文的《长河》等。音乐、木刻、漫画方面，在抗战时期也出了许多精品，即使抗战文化在受到国民党当局竭力打击和压制下，抗日歌曲如《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深受群众欢迎的歌曲，仍在城乡、厂矿、军营和学校广泛流传。

抗战文化运动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南方局的组织领导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扬新文化运动的战斗精神，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抗日民主事业，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载《四川党史》1999年11月增刊）

^①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522页。



异军突起的“左联”东京分盟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不久，在日本东京的叶以群（华蒂）、任钧、谢冰莹等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以下简称“东盟”）后，即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取得联系，互相交流本国进步文化界现状及斗争情况，还参加了该盟的一些活动，并访问了秋田雨雀等进步作家，写成《访问记》向国内介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步文化人士纷纷回国，“东盟”无形中停止了活动。此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怒潮高涨，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左翼文化运动也进行文化“围剿”，左翼文化人士受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不少人被迫撤离上海、广州等地东渡扶桑。从1933年到1936年间从国内到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留日学生竟达500多人。^①

“左联”东京分盟的恢复和活动

1933年9月，左联成员林焕平赴日本前，“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找林谈话，授意他到日本后，找尚在日本的“左联”成员孟式钧，把“左联”东京分盟恢复起来，团结在日本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左翼文化活动。

1933年12月“左联”东京分盟正式恢复（或称东京支盟），成员有林焕平、孟式钧、林为梁（林基路）、陈斐琴（陈松）、陈一言、魏晋、欧阳凡海七人，由林焕平、林为梁、陈一言组成干事会，负责日常工作，林焕平任干事会书记，与上海的周扬单线联系。1934年林焕平出面编辑《东流》月刊，

^① 蔡伯华：《回忆东京左联活动》载《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697页。

由林为梁任干事会书记。1935年林为梁返国，由魏猛克、陈辛人、孟式钧组成干事会，魏猛克任书记。当时“东盟”的活动中心设在神田区青年会，成员分小组进行活动，公开活动则通过文艺界座谈会的形式，大致一周或两周聚会一次，每次都有中心议题，如“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间有新到东京的同志报告国内情况。通过座谈交流情况和专题讨论，无形中把进步文化界团结和组织起来，在东京开展了左翼文化活动。

“东盟”恢复后，即着手筹备创办文艺刊物，于1934年6月成立了“东流文艺社”，以同人刊物形式，于同年8月出版了《东流》月刊，由林焕平出面编辑，加林为梁、陈斐琴、欧阳凡海组成编委会。刊物在东京编辑，寄回国内，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东流社”集中了一批在日的爱好文艺的中国青年，如梅景铎、俞鸿模、王阑西、陈七廉、麦穗、陈达人、邱东平、张天虚等，都参加了“东流社”的活动。他们中有的是盟员，有的并非盟员。“东流社”准备出一套《东流丛书》，已出版的有陈子谷的诗集《宇宙之歌》、俞鸿模的小说《炼》、张天虚的长篇小说《铁轮》、斐琴、达人合译的妥斯退益夫斯基小说《白夜》等书。

1934年以后，由于国内形势日益恶化，到东京的进步文化人士愈来愈多，从上海陆续到东京的有魏猛克、杜宣、蒲风、吴天、聂耳、黄新波、任白戈等，从北平去的有陈辛人、陈子谷、林林、张香山等。人员增多，一个刊物已不能适应大家的工作需要，“东盟”又创办了《杂文》和《新诗歌》两种杂志。

《杂文》月刊于1935年5月15日创刊，专载小说和理论文章，由杜宣出面编辑，魏猛克、陈辛人、孟式钧、林焕平组成编委会。第一期同《东流》一样在东京编辑，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第二、三期则在东京编辑、印刷，寄回上海发行。由于内容比较尖锐泼辣，在国内反响很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第三期即被勒令停刊。《杂文》被禁后，从12月15日改为《质文》在东京继续出版，由邢桐华出面编辑，仍不断受到日本警方干扰，邢桐华经常受到质讯，终于出版至第七期被迫停刊。

《新诗歌》由蒲风主编，由林林、陈子谷组成编委会，在东京出版发行。诗歌社通过诗歌座谈会聚集了一批诗歌爱好者，大致两周一次聚会，讨论诗歌的理论和创作问题。主要成员有蒲风、林林、陈子谷、澎湃、富石榆、林蒂、陈紫秋、魏晋、蔡冷枫等。诗歌社还出版了蒲风的长诗《六月流火》。

1935年国内形势更加恶化，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又先后来到东京，增强了“东盟”的力量。除“东盟”外，还成立了“社联”、

“剧联”、“语联”和“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

社会科学左翼联盟简称“社联”，它的公开组织是文化座谈会，经常参加的有六七十人，分组秘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哲学等。主要成员有林为梁、官亦民、陈健、李云扬、梁威林、苏曼、周如傅、侯甸等。

戏剧左翼联盟简称“剧联”，有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学会、戏剧座谈会和国际戏剧协会等三个团体。留日学生戏剧学会负责人是陈北鸥、梁梦回（延武），主要成员有田丰、邢振铎、王威治、张泽民等。戏剧座谈会负责人是官亦民，主要成员有吴天、张瑞华（水华）、杜宣、李月轩。国际戏剧协会负责人是陈斐琴、叶文津、吴剑声，成员多数是广东人。三团体先后公演了《雷雨》、《复活》、《洪水》和《马门教授》等进步戏剧。后来，三个戏剧团体合并为中华留日学生戏剧协会。

世界语左翼联盟简称“语联”（包括拉丁化协会），它的公开组织是中国留日学生世界语学会、世界语学习班、世界语座谈会和拉丁化协会、拉丁化文字座谈会，参加者约有七八十人。主要成员有陈健、丁克、陈学诗、陈紫秋、刘仁、苏曼、杨克毅、张翼、郭宏基等。

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东京各大专学校都有中国的留学生，都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会，各派出代表成立了学联。学联通过各校成员为核心开展活动，主要成员有林为梁、苏曼、李佩星、潘沃权、杨克毅等。

1935年秋，任白戈到东京后，按周扬的示意，组织了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由任白戈、何干之（杜鲁人）、官亦民三人组成“文总”干事会，任白戈任书记，领导“左联”东盟和剧盟，何干之分工管宣传，领导“社联”，官亦民分工管组织，领导“语联”。在东京的各左翼文化团体由“文总”统一领导，协调作战。“文总”存在约半年时间，即随“东盟”的解散而结束。接着任白戈遵照周扬的意见，成立核心小组起党的领导作用，成员有任白戈、魏猛克、陈辛人、林林、张罗天、孟式钧等，领导各文艺团体。社会科学方面也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有熊唯知、雷任民、解树椿、毛掬、王国权、王孔照等^①。1937年春，任白戈回国时，即将两个核心小组交到刚到日本的钱亦石领导。

^① 任白戈：《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载《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83页。

鲁迅、郭沫若对“东盟”的指导和扶持

“东盟”和在东京的各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大多数是爱好文艺的留日青年学生，谈不上什么艺术修养和学术成果，仅凭一股爱国热情和革命意志，能在国内外环境都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在异国开展左翼文化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这与鲁迅和郭沫若两位前辈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鲁迅远在国内，却给这棵小小的文坛幼苗以热情的扶持。他先后寄了三篇文章在《杂文》上发表，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什么是“讽刺”？》、《从帮忙到扯淡》^①。当鲁迅收到《杂文》第二期的约稿信后，感到非常高兴。因当时国内左翼作家的文章已很难发表，见国外有这样一个文艺刊物，而且在国内发行，立即回信表示支持，还在信中关切地嘱咐，要注意策略，不要色彩过于鲜明，以至出不下去。^② 鲁迅看到他的文章和郭沫若的文章，同时出现在《杂文》第三期上，更是高兴，他在来信中说：“看见郭先生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因为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镇压，左翼作家的作品很难发表出去，郭先生能出来发表文章，很好。但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在这样的時候，郭先生如能较长时间地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③

在东京的郭沫若看了这封信，很受感动。从此消除前嫌，加深了友情。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中国留日学生集会追悼，郭沫若在会上致悼词，并作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④，东亚西欧同饮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还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在《质文》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称赞鲁迅“是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个杰作”，“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一个新纪元”。^⑤

两位前辈支持了“东盟”，“东盟”对两位有过文艺论争的前辈，也起了积极沟通和促进团结的作用。

当时郭沫若在千叶，有时还参加“东盟”的聚会，更能就近给予指点和帮助，特别对“东盟”的刊物，十分关心和支持，不仅经常赐稿，还亲自参

① 林焕平：《从上海到东京》载《左联回忆录》（下），第691页。

② 魏猛克：《回忆左联》载《左联回忆录》（上），第395页。

③ 魏猛克：《回忆左联》载《左联回忆录》（上），第396页。

④ 指高尔基和鲁迅在同年逝世。

⑤ 林林：《“左联”东京分盟及三个刊物》载《左联回忆录》（下），第709页。

加校阅样稿。《质文》就是郭沫若建议改的刊名。“东盟”办的三个刊物，几乎每期都有郭沫若的文章，先后发表的有《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日文化交流》、《孔夫子吃饭》、《小小的礼物》（诗），历史小说有《贾长沙痛哭》、《孟夫子出妻》；为响应国内提倡文字拉丁化写了《请大家学习新文字》等文章，为支持在东京演出的《雷雨》，发表了《关于曹禺的“雷雨”》一文，加以宣传和评介；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郭沫若参加了“东盟”的讨论，写出《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为悼念高尔基写了《人文界的日蚀》；为悼念鲁迅写了《民族的杰作》等等。“东盟”出版《文艺理论丛书》，郭沫若为之作序。

茅盾、田汉、曹禺也给《杂文》寄稿，这些著名作家的稿件，大大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对“东盟”工作的支持和鼓舞极大。

“东盟”的历史功绩

30年代，无论国际国内都处于革命大转折的年代，也是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激烈斗争的时期，在国内左翼文化界受到严酷镇压和打击的情况下，陆续疏散到日本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在东京重聚力量，紧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东盟”的恢复，如异军突起，在国外开辟了新的阵地。以“左联”成员为核心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团结在东京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留日学生，先后创办了几个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充满爱国热情，倾向进步，敢于揭露黑暗的作品，还经常刊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的文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刊物在上海出版发行，因经费不足，出版册数有限，经常不能满足读者需要，青年学生争相传阅。刊物内容十分注意配合国内革命斗争和左翼文化活动。为配合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发表了魏晋反映上海工人暴动的《再生》，林林关于反封锁题材的《食盐斗争》等作品。为悼念高尔基逝世，《质文》二卷一期出了纪念专刊。鲁迅逝世，“东盟”组织留日进步学生，在东京举行了追悼大会，在《质文》二卷二期出了悼念鲁迅专辑。国内发生“两个口号”之争，“东盟”也组织了座谈讨论。“东盟”在东京开展的左翼文化活动，是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出版的论著、作品和译著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

在郭沫若就近指导下，“东盟”培育了一批文化战线的生力军。“东盟”成员除任白戈、蒲风等少数职业作家外，绝大多数成员是中国留日学生，他们通过各种座谈会和小组学习，在革命文艺的熏陶下，特别是在郭沫若的指

导和关怀下，在郭沫若文章的思想影响下，逐步转变思想，再经过斗争锻炼和创作实践，逐步提高了政治和创作水平，造就了一批文艺战线的新生力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文艺战线准备了骨干力量。抗战爆发后，他们纷纷回国参加抗战，其中不少人被日本当局作为“中国反日作家”驱逐回国，这正说明他们不仅是一批爱国留日青年，还一批卓有战绩的爱国青年作家。他们中许多人回国后，成为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有的后来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如林基路 1943 年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官亦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邱东平 1941 年在盐城反“扫荡”中牺牲。

“东盟”还为宣传介绍革命文艺作品和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东盟”的成员大多从事日文翻译，他们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德永直，中条百合子等的短篇小说，还从原文或日译本翻译了德国海涅、美国惠特曼、法国罗曼、罗兰、苏联高尔基等的小说和马雅可夫斯基、信斯勉斯基、马特内依等的诗作，大量宣传革命文学和介绍世界文学动态，还翻译了许多革命文学理论。《质文》编辑出版了一套文艺理论丛书，计有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著《艺术作品之真实性》、辛人译吉尔波丁的《现实主义论》、信斯巴洛夫的《批评论》、林林译高尔基的《文学论》，邢桐华译纪德的《文学拥护》，猛克译罗森达尔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任白戈译西尔列尔的《科学的世界文学观》，孟式钧译西尔列尔的《现实主义论》，张香山译罗森达尔的《现实与典型》，辛宛译高濂太郎、甘粕石介的《艺术史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论著。正如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使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学习运用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是“左联”的一大功劳。“东盟”的青年作家们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努力，为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载《百年潮》2001 年第 9 期）